

王小谟： 用一生为祖国打造“千里眼”

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等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引领中国预警机事业实现跨越式、系列化发展……他坚信“中国人一定能行”，终其一生为祖国国防事业打造“千里眼”。

他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2023年3月6日，王小谟溘然长逝，享年84岁。新中国成立75周年前夕，王小谟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要为国家站岗放哨”

王小谟说，雷达事业的重大意义，就是要为国家站岗放哨。

1961年，从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的王小谟，被分配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14研究所（今中国电科14所），从事雷达研究。

雷达被称为国防“千里眼”。上世纪60年代起，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达研究的前沿领域。此前，14所已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只留下一摞资料。当时，我国电子工业水平整

体不高，迫切需要研制出自己的雷达装备部队。面对严峻的形势，王小谟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世界一流的雷达，为国争光！”

一番苦心研究后，王小谟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当时世界领先的脉内扫描方法，为日后的雷达研制打下基础。一年后，英国才提出同样的技术方案。

1969年，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王小谟与同事们投身贵州黔南大山，创建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科38所），开启了筚路蓝缕的创业岁月——住在四面透风的油毡茅棚

里，交通不便、食物匮乏……而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1972年，王小谟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主持研制首部国产三坐标雷达。

经过十余年的大胆创新、潜心研制，历经无数次试验失败的至暗时刻，1984年，我国第一部集成化、数字化、自动化的三坐标雷达在贵州山沟中成功问世！此后，我国三坐标雷达一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我国防空雷达从单一警戒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功能的重大跃升。三坐标雷达家族由此成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主干力量。

打造中国自己的“争气机”

预警机被称为“空中帅府”，战争中拥有了预警机，就如同“深夜用肉眼看见20公里外有人划了根火柴”。上世纪90年代时，预警机已成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1992年2月，王小谟调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开启我国预警机装备的论证与研制。当时，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一部分人认为需求紧迫，“造不如买”；王小谟等人则主张自主研制。

“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一旦战争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最终，国家决定“两条腿走路”：一边引进国外产品以应急需，一边与外方合作研制国产预警机。

作为中方技术总负责人，王小谟深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坚决主张并部署安排国内同步研制。其间，他在国际上首创了背负式、大圆盘、三面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新型预警机方案。

2000年，外方迫于压力终止了与中国的合作，王小谟力主自主研制预警机，并主动请缨主持研制。

“一定要争口气！”夏天40多摄氏度的高温，冬天零下30多摄

氏度的严寒，90分贝以上的噪声，都没有让王小谟退缩。他在条件简陋的试验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为早日实现心中蓝图。

历尽艰难成伟业。多年攻关，研制团队突破了100余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项，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中国预警机第一次在世界面前公开亮相，引领机群飞过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70岁的王小谟流泪了。

“把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

这些场景，很多老同事历历在目：在预警机工程的关键时刻，王小谟顶住遭遇车祸和癌症的双重打击，坚持在病房交流工作；临终前，他刚刚化疗结束，就直奔会场阐述预警机总体关键技术……

“王王小谟只说：成长、奉献于这个时代，我感到非常幸运。”

2013年，王小谟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面对聚光灯，他不愿多谈自己的成就，却拿出500万元奖金中的450万元，又多方筹集2000万元，设立了雷达创新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雷达和预警探测技术领域做出贡献的年轻人。

这是甘为人梯的拳拳之心——为了使年轻人得到锻炼，他经常组织专题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把重要的方案设计交给年轻人，同时又给予具体指导；他牵头编写的《雷达技术丛书》，影响了几代雷达人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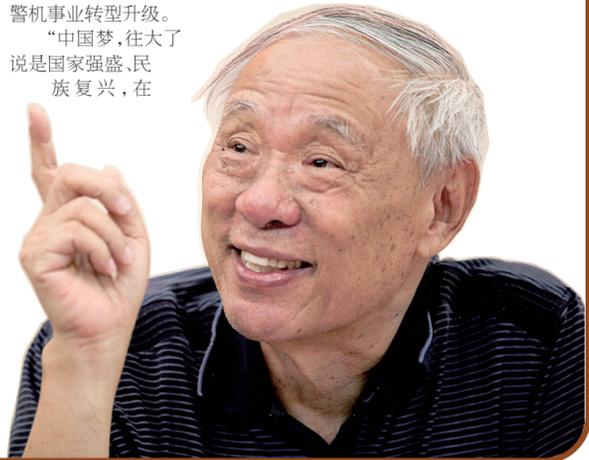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年

轻人陆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为我国预警机事业积蓄了发展后劲。

这是殚精竭虑的赤子深情——直至耄耋之年，王小谟仍坚持上班，与年轻人一起讨论技术问题。2022年，他领衔成立空基技术实验室，谋划推动预警机事业转型升级。

“中国梦，往大了说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在我这里，就是要把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做到卓越。”他说。王小谟离开了，他开辟的道路，后辈们还将坚定地走下去。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张晋藩：让中国法制史的参天大树根深叶茂

他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出版60余部专著、主编20余部中国法制史教材，培养了我国第一届法制史专业博士生，培育出百余名博士毕业生。

在70余年治学育人生涯中，94岁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始终秉持“不偷懒、不自满”严谨态度，多年来甘愿坐“冷板凳”，“从不敢说一句狂话”。他读书立志，立德树人，桃李满天下。

“为国家富强而读书”

为国家富强而读书，是张晋藩从小立下的志向。

“1930年我出生在沈阳。我的童年是在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下度过的，那时历史课不教中国的历史。”张晋藩回忆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侵略者就是要让中国人忘记自己的根。”

“祖父因饥荒过世。战乱频仍，想买一口棺材都没地方买。幼年时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激励着我要为国家富强好好读书。”张晋藩说。

1949年7月，张晋藩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此后转入

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当初，在不少老师和同学眼中，资质出众的张晋藩就读冷僻的法制史专业有些屈才。但是，在酷爱读书尤其是爱读史书的张晋藩看来，这个选择真是天大的幸事。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古代法律的内容精彩纷呈，传承中华法制文明，可以弘扬中华民族在法制上所体现的坚韧进取的民族精神，激发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内在的潜能。”张晋藩说。

1979年以前，国外曾三次召

开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都未邀请大陆学者参加，这严重伤害了包括张晋藩在内的中国学者自尊心。

张晋藩说，必须要加快编辑出版《中国法制通史》，不能让子孙后代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

自此，张晋藩牵头召集国内法制史学界的学术力量，历时19年时间，苦心钻研，出版《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为新中国法制史学科做出奠基性、开创性工作。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正式出版，全书共10卷、500余万字，被意大利学者誉为中国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

为发展中国法制史载欣载奔

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张晋藩留校任教，从此在中国法制史研究和教学之路上辛勤耕耘，不断开风气之先。

除了《中国法制通史》，张晋藩牵头历时23年编辑出版《中华大典·法律典》，耗时16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发表新中国涉及古代民法第一篇论文，撰写《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史》等享誉学界的著作60余部，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史》《中国民法史》等

30余部专著和20余部教材，发表专业论文430余篇，其部分专著和文章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出版。

尽管著述等身、载誉天下，但张晋藩始终恪守“不偷懒、不自满”治学原则。

“对于一些发表过的文章，时不时重读一下，看看是否要修改。”他说，“什么时候也不敢说一句狂话，自己只是看到法制史殿堂的门槛，载欣载奔而已，距离‘达到’还远着呢，因此也不敢偷懒。”

由于长期的辛勤劳累，加上年龄不断增长，如今张晋藩的视力严重下降。但是，借助高倍放大镜，他仍然每天上午八点半开始工作，坚持阅读写作、指导研究生论文。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完成这些项目，就是为了发展中国法制史学，弘扬五千年的中华法文化。”张晋藩说，“我深切感受到，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强大的文化支柱，一个国家就很难全面发展、真正强盛。”

推动中国法制史学科桃李满天下

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是张晋藩坚持一生的事业。

张晋藩的第一位博士生、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朱勇说，老先生以其高尚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以其坚毅的性格和辛勤的汗水，铸就了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

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研究生院。同年7月，张晋藩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中国政法大学主持研究生院工作。当时，中国政法大学首批招收

了125名硕士研究生。

张晋藩介绍，一次招收这么多研究生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国政法大学的师资力量完全不可能胜任，必须聘请校外的专家，组成各个硕士学科的导师组，才能完成任务。当时他积极聘请的校外导师几乎涵盖京内外法律院校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受聘的专家非常积极地投入这项工作。

除学业教育外，张晋藩格外重视道德教育。他说，培养

人才首重立德，这是做人的根本。只有巩固这个根本，才能够发挥所学，为国所用。

自1984年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博士生以来，张晋藩迄今已培养博士生百余人，其中包括多名外国留学生。如今，张晋藩仍然坚持给每年新入校的博士生上课，并亲自带博士生。

“只要身体能顶住的话，我还是要多读一点东西、多做一些研究。”他说。

我们的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为民族培养良好基因代代相传

心灵 的进化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中共河源市委 河源市文明办